

空间 文化 表演

东北A市男同性恋群体

的人类学观察

富晓星◎著

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爱的能力



光明日报出版社

空间、文化、表演：东北 A 市 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

富晓星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空间、文化、表演: 东北 A 市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富晓星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12-2634-1

I. ①空… II. ①富… III. ①男性—同性恋—研究—东北地区 IV. ①D. 66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0146 号

空间、文化、表演: 东北 A 市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

著 者: 富晓星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曹 杨 刘景峰

责任校对: 华 山

封面设计: 雨轩设计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58 (咨询), 670782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caoya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6 8 千字 印 张: 16. 875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634-1

定 价: 30.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在中国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界，同性恋研究至今仍然数量较少。同性恋话题的敏感性当然是阻碍更多相关研究出现的主要原因，但另一原因是相应的社会调查起步较晚。民国期间，社会调查虽然一度蔚然成风，而且很多调查者关注了中国社会的性存在问题，但当时并没有出现专门针对同性恋的社会调查。新中国成立之后，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实在难以促成社会学家针对同性恋问题的社会调查。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大陆报章杂志确实刊登了部分有关同性恋的评论或介绍性文章，但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却迟迟不见踪影。这一瓶颈直到 1992 年才被突破，其标志是社会学家李银河发表的一篇有关北京地区男同性恋的调查报告。随后，社会学家潘绥铭从艾滋病防治角度也发表了两篇相关且有质量的论文。从此，涉及男同性恋群体的社会调查逐渐增多，而且从社会学扩延人类学。

富晓星博士这部田野调查专著基于她在东北地区扎实的四年田野经验，在充足翔实的观察和访谈资料基础上，为人类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富晓星博士从开篇就点明，空间—文化是本书的研究主题，并作为论说框架清晰地贯穿于全书。利用空间这一分析概念，可谓是为同性恋研究提供一个重要而又新颖的理论视角。首先，作者将男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态划分为三个空间维度来理解，分别为城市空间、家庭空间和商业空间。通过这三个空间的细致描述，作者不落痕迹地向读者展示东北地区男同性恋群体在历史、地理、婚姻、家庭、情感、行为、交往、娱乐等方面的全景生活。我们需要知道，国际人类学界目前缺乏针对同性恋的整体性大规模研究，非英文的民族志文献更是极度匮乏。本书有助于国际学界了解中国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况，也可为中国人类学界率先提供东北地区民族志的深度研究和重要的基础性参考。其次在空间的具体论述中，作者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使用社会学家

列斐伏尔和地理学家索亚的“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分析框架，着力探讨了城市空间中，“点儿”的行为和交往及其背后眼神的符号意义；家庭空间中，隐藏在制度婚中的隐性婚姻形态及其背后关于责任和权力的思考；商业空间中，男男性服务者跨地域的组织和流动及其背后遍布全国的“蛛网式”性交易网络。

通过对男同性恋群体生存载体的多维空间性建构，作者自然而然地引出同性恋群体在不同空间中的文化生产，解析出同性恋群体相对于制度的文化性调适和存在，令人信服地领略这一框架对于理解这一特殊人群的重要性。这不仅操作化了作者开始借用的第一、第二空间框架，而且通过融入文化和空间的互构，推进了空间分析框架的发展。作者还赋予空间“灵性”，将其视为主体，藉以分析其对同性恋的行为、情感、身份的流动的重要能动作用，这种后现代意味颇浓的研究走向也是以往研究很少涉及的极其新颖的研究主题。总之，“空间”在本书中并非静止的存在，其依存于地理区域却又远远超越于它的强大解释力，使得传统人类学的分析具有新意，不仅表达了理论上的抽象和关怀，更重要的是这种空间框架在同性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启发性的方法论意义。

在国际学界，无论是民权运动、社群发展、文化政治还是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至今仍旧是欧美话语占据主导地位，以致影响着全球同性恋文化的发展。换句话说，全球同性恋文化正趋向同质特征，均以欧美同性恋的性存在状态作为自我认同标准，这意味着非西方语境下的同性恋文化逐渐陷入“失语”状态。富晓星博士在调研中发现，东北地区同性恋群体使用非常有趣的地方语汇，比如“铁子”、“拍儿”、“做活儿”、它们和舶来的“Gay”与“同志”交替使用，构成活色生香的地方语境。虽然在日常生活中，“Gay”与“同志”是基层同性恋群体最常使用的自称，然而内里却是去西方化、去港台化，这表现为他们依然选择自己熟悉和认同的生活方式，如同性性行为只是一个喜好、人生最大幸福还是有家有后等。地方历史和文化的强韧性使得西方同性恋文化传播限于表面性移植，这无疑引发出一个更具争议的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同性恋身份？如果有，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作者在这个问题的解析上无疑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不仅对欧美主导的身份话语进行了中国本土性回应，体现了同性恋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也是中国人类学界独有的理论发现。

此外，本书不仅体现对同性恋这一社会现象的学术关注，更为重要的是为这一群体开展进一步的制度化关怀和规范等实践提供理论依据。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即使同性恋群体比例较低，其数量仍然构成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目前，针对这一边缘群体的婚姻、健康等权益话题也成为社会的热点话题。比如，男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流行趋势逐年剧增，十分严峻。作者倡导根据男男性交易网络的文化特点，致力于将减低危害的知识在本土意义系统中进行阐释，将更新了的信息与策略整合到区域性防艾活动中去。这些努力都是本书的应用意义所在。

总之，富晓星博士撰写的这本基于实地调查的厚重著作标志着同性恋研究领域，人类学界的重要成果之一。它的特殊意义不仅仅在于精致的社会分析，而且在于作者对社会宽容的接受和对文化多元的理解。我乐之为序，向人类学社会学同仁推荐这部力作。

景 军

2012年5月10日于清华社会学系

序 二

我是一位公共卫生工作者，在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中结识了富晓星博士。我们知识构成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人生经历不同，这诸多不同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存异，体会争论和启发的愉悦，分享彼此学科的知识，探索科际合作的旨趣。我带着学习的态度和好奇的心理，仔细阅读了富晓星博士此部关于东北 A 市男同性恋群体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对于书中不少人类学的专业术语和相关理论，我开始感到费解，现在也不很自信能精准把握。我现在的理解就算是我作为科学主义的客体对此篇著作当前的“客体建构”吧。

在我看来，世界万物只要渗入人类的思维就可以说是建构的。当然，这个建构可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其一是对于客观存在的世界的描述，不管它在目前的人类视野中是已知还是未知，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客观）存在。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被描述出来，就是广义的建构；其二是在这个事实描述的基础上，进行意义（主体或客体）的解释，这是狭义的建构。当然，事实建构也有取舍的标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自然是不一样的。根据我的知识体系，我认为自然科学以三个标准来作为建构取舍的标准：一是概念清晰、论证合理的逻辑标准；二是对描述的事实进行测量与否证的实证标准；三是对事实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告的预测标准。相较于这三个简明扼要的科学标准，人文社会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类学的文化建构却要复杂得多，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狭义建构是否符合研究对象（主体）的解释标准。通过这样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到，越靠近狭义建构，事实的面貌越呈现多样性，越具有人文性。越接近广义建构，事实越呈现单一性，非常接近大众接受的事实本身，从而更具有科学性。当然，我在这里并没有人类学建构不需逻辑标准和实证标准之意。

据我所知，几乎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总有一些人对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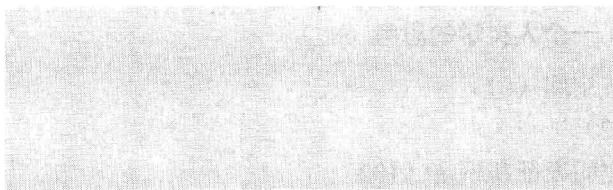
同性充满着愉悦感，而这种愉悦感和生理上的性刺激有关。无论有同性偏好的群体生活得多么压抑，这个事实是不随时间和空间转变的，这个在我理解就是同性恋群体生存的本质。这个本质具有生物性特征，是解释人类社会现象的生物性基础。当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可在这个生物性基础上，进行各个学科的五彩缤纷的理论阐释和建构。我和我的同事，公共卫生工作者，多接受的是科学本质主义教育，我们追求的是可以推广的、可预测未来的结论。从防治艾滋病的需求出发，人类学关注主体对疾病及其意义的解释。这个观点站在公共卫生视角来看，最大的缺陷是你们的研究结论多是地方性产出，我们希望得到可以推广复制的有效干预模式。所以，公共卫生对这种人类学研究有些失望。

但是如我开头所述，这并不妨碍我和富晓星博士探讨科际合作的可能和潜力。一年多来，我们经常坐而论“道”，就某些公共卫生问题，如吸毒、艾滋病、吸烟等进行跨学科视角的讨论。作为彼此的客体，我们看到了各自学科理论和方法上的盲点，并试图从各自的学科体系烛幽探隐，能够在某些问题的某个“点”上摸索出切实可行的跨学科合作方案。比如说富晓星博士的这篇著作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就有启发：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总有一些追求男男性行为的人群；这种追求的欲望不变，可是其表现形式必需适应社会制度的要求，必然会随文化不同而不同，表演出千差万别的多样性来。公共卫生工作者，有可能从干预制度或/和文化入手，改变高危性行为的表现形式，达到防治艾滋病流行的目的。

同时，我希望我的同行，尤其是防治艾滋病的公共卫生工作者可以认真阅读一下这部著作，也希望科学主义和人文社科可以放弃各自的学科壁垒，能够真诚地交流彼此的“建构”；让我们也站在对方视角体会一下主体的意味，做出一些有益的合作尝试吧！

王若涛

2012年1月25日于马家堡住所



Nantongxinglianquntiderenleixueyanjiu

目 录

第一部分 导 论

第一章 研究缘起与分析框架 (3)

- 一、同性恋研究：人类学的“禁忌”？ (3)
- 二、空间—文化的讨论 (5)
- 三、研究方法 (9)
- 四、叙述框架 (13)
- 五、界定“同性恋”：一个引子 (15)

第二章 人类学的同性恋研究 (23)

- 一、20 世纪上半叶：游离于医学科学的边缘 (23)
- 二、1960—1980 年代：历史—文化建构成为关键词 (31)
- 三、1990 年代至今：酷儿政治及未来发展走向 (42)
- 四、中国本土的同性恋研究 (46)

第二部分 城市空间、符号和情欲

第三章 “点儿”的形成和变迁 (55)

- 一、“点儿”的形成 (56)
- 二、城市空间和性：一个分析的框架 (67)

三、“点儿”的变迁（79）

第四章 空间与文化：一个人类学的思考（87）

一、人类学的第三空间（87）

二、符号空间（92）

三、活动区域的空间表征和框定（102）

第五章 时间设置：交往模式的古今关联（108）

一、历史—社会的宏观观察（108）

二、市场经济、空间与性（114）

第二部分小结（135）

第三部分 家庭空间、责任和权力

第六章 生育家庭空间：婚姻形态（139）

一、中国语境下的双性恋群体（140）

二、婚姻形态（146）

第七章 生育家庭空间：责任与权力的思考（167）

一、对父母的责任（168）

二、对妻子的责任（178）

三、权力视角中的妻子（188）

第三部分小结（192）

第四部分 商业空间、网络和性别

第八章 商业性服务者的网络：女男和男男视角的比较（197）

一、男男性服务的已有研究（197）

二、性服务者入行方式（200）

三、性服务场所的分类（204）

四、网络空间：男男性服务场所的“蛛网式”结构（211）

第九章 公共空间中的男男性服务者：性别表演和艾滋病风险（217）

- 一、公共空间中男男性服务者的组织特点 (217)
- 二、男男商业性服务中的“表演”实践 (222)
- 三、艾滋病风险行为及预防干预策略 (226)
- 第四部分小结 (229)

第十章 结 论 (231)

- 一、作为“公领域”的家庭空间 (232)
- 二、作为“私领域”的城市空间 (233)
- 三、作为情感和身体消费的商业空间 (236)
- 四、表演生产文化表征的“第三空间” (2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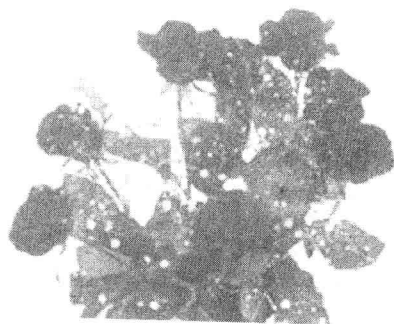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240)

附录 (253)

致谢 (256)

第一部分

导 论





Nantongxinglianquntiderenleixueyanjiu

第一章 研究缘起与分析框架



一、同性恋研究：人类学的“禁忌”？



笔者对男同性恋群体产生研究兴趣始于一次项目经历。2004年，笔者跟随导师庄孔韶教授，到四川成都和云南昆明参与当地男同性恋群体艾滋病防治项目的经验总结工作，这是笔者第一次“经验接近”（Experience-near）地接触这一“潜伏”群体，并遭遇前所未有的文化震撼^①。这种震撼不仅仅是宏观层次上，同性恋群体的“性”（包括性兴奋、性需要、性满足、性吸引、性行为、性幻想等综合要素）与异性恋群体（为了叙述的需要，暂做宏观的分类）的不同及难于触碰；而且从微分层次上，不同地域（如成都和昆明）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环境模塑出这一群体的不同风貌。这不禁令笔者对男同性恋群体的感情、行为、交往以及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坦白地说，选择男同性恋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似乎不太符合人类学的传统口味，并且中国人类学者还未正式涉足同性恋研究领域。笔者拿出“吃螃蟹”的勇气探询，并将这段旅程的起点定在故乡东北A市。选择这个田野点，一是缘于笔者的刻板印象：在东北那么“男人”的土地上，会不会有这么“不太男人”的群体？二是因为自己从小生活的这个城市比较熟悉，对东北方言和文化也了解甚深；三是从国内学界情况（不仅

^① 这种震撼也许在今天越来越开放的“性”语境中看似有点可笑，但将时间推回到2002年，在艾滋病疫情严重的省区（如四川、云南）的男同性恋群体中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刚刚起步，对这一群体的了解才藉由这一平台慢慢开启。

仅是人类学)来看,还没有以东北地区同性恋群体为对象的研究出现。一个新领域肯定会有多向度的新意与研究价值,笔者秉持反思的态度尝试迈出微弱的第一步。

从国际学界来看,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研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同性恋”在人类学史上是一个“禁忌”的研究命题,鲜有人类学家敢于将异文化中的人类性行为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阵地。西方人类学研究同性恋群体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在第二章中会有详述):(1)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深受本质主义话语的影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选择退避三舍或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模型来看待这个问题。(2)1960年代发轫的反思性自我批评使得性别尤其是同性恋研究获得了合法性,然而对此领域的职业抗拒仍旧持续着。这个时代同性恋的民族志研究方兴未艾,并已脱离病理学轨道,转而重点阐述特定地理区域的特定文化如何组织和模塑同性性行为。(3)1970年代开始,强调文化的影响的模式在同性恋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与正逢其道的社会建构论有所交叉。然而,人类学界对此问题的惯有冷漠使得文化持有者“主位”的声音隐而不论,这与社会建构论强调的“主体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是在这一时期,人类学提出新的理论追求,期待跨学科合作,比如将历史研究、性别研究、艾滋病防治实践融入至人类学的田野。(4)1990年代,酷儿理论的兴起与人类学的发展有了合作的契机,这样一种交叉趋势在21世纪初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酷儿人类学分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今天,致力于同性恋研究的人类学者仍旧痛心地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将付出学术声望和职业限制的严峻代价。

由于同性恋研究一直在人类学史上处于边缘地位,其整体性的大规模研究甚少开展,尤其是非英文的民族志文献的极度匮乏已然成为人类学界的担忧所在。并且目前的情况是,无论是民权运动、社群发展、文化政治还是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仍旧是欧美话语占据主导地位,以致影响着全球同性恋文化的发展。换句话说,全球同性恋文化正趋向同质特征,均以欧美同性恋的性存在状态作为自我认同标准,这意味着非西方语境下的同性恋文化逐渐陷入“失语”状态。

人类学讲求文化多样性,在地方语境中,包括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情境中探讨地方同性恋群体的情感、认同、发展等方面是人类学的终极关怀所在。由大地方至小地方,大人口至小人口的层级分梳,更能

通过文化的透镜凸显出不同层级人群细致的生活状态。同性恋群体虽然在整个人口比例中占据少数（约占总人口比例的 2%-5%^①），但其绝对数量可不少；并且其中的亚群体样态多元且复杂，这也需要除却宏观统计数据之外的细致梳理与分析。

二、空间—文化的讨论

本书就是在上述背景下，集中探讨中国东北地区一个极富代表性的都市——A 市中男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况。在笔者对这一可供观察的实际存在的群体历时四年（2007—2010）的研究中，发现男同性恋群体的行为和交往具有显著的“空间性”，这引起笔者的浓厚兴趣。在本书的论述框架中，笔者以“空间”作为具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解释项，从而有效地发现新问题，力图以一种新方式厘清男同性恋群体相关的复杂事项，系统地解决研究问题，最终得出人类学的观察效果和理论收获。

空间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我们置身其中，却言说不清。它依存于我们可体验的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点却又远远超越于它。实际上，空间可以有很多种划分。如反应社会关系、网络、阶层、社会角色的社会空间，观察个体和群体行动的行为空间，包括主体经验性感受和思考与非经验性想象并存的认知空间，当然还有一经出现，即颠覆所有传统空间的“赛博”（Cyber）空间。不可否认，上述的各种空间彼此有叠压，如何去界定和划分要依据研究者的专业背景和研究主题而定。仅简略举例，生态学的诸分支（人文、风景、社会等）、地理学的诸分支（人文、行为、历史、政治和经济等）、规划学的诸分支（城市、土地、环境等）等均是以前人类生存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他们各自的角度和不同方法，恰恰有利于发现空间的差异性，并寻求跨学科合作，以获得我们对于空间的多向性、整体性理解。

① 一些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和卫生统计研究均得出这个结论。这也是目前国家进行同性恋人群规模估算的依据。具体可参见张北川、李银河的相关著作。

本书试图从人类学角度，从空间的视角来研究东北A市男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况。在正式进入人类学的论述之前，笔者先简单介绍几个本书使用的和空间有关的核心概念^①：

设置 (Setting)：由不断发展的活动组成的环境。活动和环境由文化规则连接，设置及其中的活动随文化规则的变化而变化。设置多指小规模环境，如同性恋群体在公园某个特定的区域闲逛就构成了一个设置。

建筑环境 (Built Environment)：从广义来看，建筑环境是一种人类文化的创造物，试图解决人类和环境的互动问题。从具体的组成来看，它包含上述的“设置”（根据不同情况，可包含一个或多个设置），和固定的元素（不可移动的物品，如房屋、墙壁等）、半固定的元素（可移动或可改变的室内或室外环境的陈设，如植物、家俱、装饰物等）。从抽象的组成来看，它包含四种元素：空间、时间、意义和沟通。这四个元素之间的互动的复杂系统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空间组织 (Spatial Organization)：空间组织的物质表达形式是建筑环境，通过场所（建筑环境本身及其所在位置）中不同形式的沟通和交流来表达人类活动。它包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无生命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无生命环境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空间通过行动系统组织起来，具体回答“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包括或不包括谁”、“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的问题。空间有系统的使用最终是基于文化的，因此空间是被文化分类的，是被社会控制的。

由此看到，设置内含于建筑环境，建筑环境内含于空间组织，这三个概念是逐渐递进的关系。文化在三个概念的操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化持有者在领域认知和空间组织的过程中，其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等级和行为活动等因素调整和决定着谁属于这里、谁拥有进入空间的权利，谁控制或者使用空间资源等问题，并通过关系的连续性从而赋予空间文化的意义。在共时层面上，同样的领域可通过多种方式被聚合，通过不同群体建构的不同设置，以及设置之间的冲突与调和，给予空间不同的标记，从而体现空间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在历时层面上，同样的空间在不同时间可构建不同设置，拥有不同用途。这既可从短时段，如

^① 设置、建筑环境和空间组织的界定，主要依照 Amos Rapoport,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Tim Ingold (ed.),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Routledge, 2002, pp460-502.